

中日周作人研究评述

山口 早苗 (YAMAGUCHI Sanae)*

本文主要考察迄今为止日中两国关于周作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做一探讨。

首先，中国的周作人研究始于1980年代。可以说，周作人研究是从对其兄长鲁迅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当时主要也是从事鲁迅研究的研究人员进行这一研究。实际上，周作人研究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得以确立，只是近几年的事；同样，周作人研究的专门研究者的出现，也只是最近的事。

周作人研究的历史较短，与其在日中战争（抗日战争）期间配合日本，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职务有关。其也因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以“汉奸”之名为人所知。

关于对周作人的评价，1942年时何其芳曾在《两种不同的道路》¹中，指出周氏思想是从个人主义出发，转向趣味主义，“其结果从寻路到迷路，从民族主义走到了日本法西斯手掌里，成为民族的罪人”，对其给予否定评价，成为当时的普遍观点。

至80年代，周作人研究仍延续关注其“汉奸”经历，且以政治性评价居多。此外，黄裳的研究颇具意义。他将周作人研究的目的并不定位于挽回名誉，而是为中国文学史提供研究资料，并以周作人这一人物为例，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为后世提供教训。这也成为一种从消极理由出发的研究模式。

不过，至1985年研究出现了转机。随着有关周作人的著作相继出版及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周作人热”。此时，作为一个“人”的周作人日渐为人关注。

在这一时期，舒芜在《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²中，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分析指出周作人坚持五四传统和知识分子的自主意识，坚决反对妨碍思想自由的行为；而鲁迅则加入左翼阵营，在与现实相妥协的同时守护五四传统。然而，这一有意提升对周作人评价的举动却遭到反对。如解志熙、袁良骏等便坚持主张对于周作人的评价不应偏离其历史性及政治性背景。

在周作人研究者中，像舒芜一样对周作人持肯定评价者不在少数。即便对于其降日过程，亦有诸多说法。如陈思和在《关于周作人的传记》³中指出“思想上的超越气节与性格上的实利主义，我觉得是周作人下水的重要原因构成（中略）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他并不想为国家民族的名分去牺牲个人的生命”。黄开发在《关于周作人的附逆及其他》⁴中指出“对人生和民族的双重悲观，构成了周作人附逆的基本原因”，分析周作人的思想背景存在“悲观”的成分。这些意见的提出是建立在周作人1920及30年代的思想发展基础上的。而时至今日，关于周作人降日方面的是非论断仍存在分歧。

其次，日本方面的周作人研究，略早于中国方面，始自1970年代木山英雄的研究。在此之前，虽然日本在战前便对周作人有所关注，但其研究方法仅限于对著作的翻译等。木山的

*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课程。

¹ 《何其芳文集 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² 《鲁迅研究月报》1987年1期。

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3期。

⁴ 《文艺报》1992年2月29日。

研究主要揭示周作人思想，其研究对象亦涉及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周作人“汉奸”问题的考察《北京苦住庵記一日中戦争時代の周作人》⁵一文。该文使用丰富的资料，对周作人当时的状况进行了客观阐述。与 80 年代中国大陆的研究相比，木山的研究可谓对周氏行动及思想进行了更为客观且同情性的分析。

在此之后，日本方面关于周作人研究的单行本专著匮乏，讨论亦并不活跃。不过，近年来日本接连不断地出版了有关周作人的数本书籍。这些书出自继木山英雄教授后挑起周作人研究重担的下一代研究者之手。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伊藤德也的《「生活の芸術」と周作人—中国のデカダンス＝モダニティ》⁶。

伊藤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在我心中，一直涌动着对仅关注周作人历史意义的反抗。（中略）大体上，对于近现代中国，日本读者的关心终究只是政治史及经济方面，而对于其文艺、思想等也仅作为政治史及经济的附属物，并非独立的关注对象。”

这一论述值得注意。从根本上说，伊藤的周作人研究并非历史研究，其重心放在关注艺术性、周氏之个性及其特殊性上。具体而言，伊藤的研究是以“颓废”等的美学、伦理学的问题为视角，探究周作人的思想。这一点已与木山英雄等的研究具有很大不同。

不过，伊藤在序论中指出，周作人即便在傀儡政权担任要职时，仍“坚守将维护个人平庸的日常生活作为自我中心的信条”，可见该书认为“生活”这一概念对周作人的“落水”问题产生了影响。虽然伊藤希望摆脱历史性角度，但其仍有沿袭木山研究的部分，可以看出其旨在探究最终沦为汉奸的周作人的思想部分。

其实，像这样将研究对象由政治方面转向艺术方面的动向，在中国大陆也已出现。譬如，黄开发指出在现代中国的周作人研究中，虽然周氏思想研究有某种程度上的积累，但关于周氏散文艺术研究却明显不足。周氏的散文以富于审美性、艺术性而为人称道，可以看出黄开发的这一论述与其一直以来的政治性关注所具有的不同。

这一动向不难理解。不过，周作人的文章本身就是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对当时政治提出的反抗，如果仅关注周氏散文的艺术性，同样有可能导致研究失衡。由此看来，日中两国的周作人研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理想的研究应把握好对历史背景及艺术性探讨的平衡。此外，还应做好对周作人与其同时代人、其所生活时代的思潮与其思想及文章的对照研究。总之，若要摆脱政治性的历史评价，从事相对客观研究，那么对其所生活时代及周围关系的考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 是非之间》河南文学出版社，2004 年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年

木山英雄《周作人「対日協力」の顛末 補注『北京苦住庵期』ならびに後日編》岩波书店，2004 年

⁵ 筑摩书房，1978 年。

⁶ 勉诚出版，2012 年